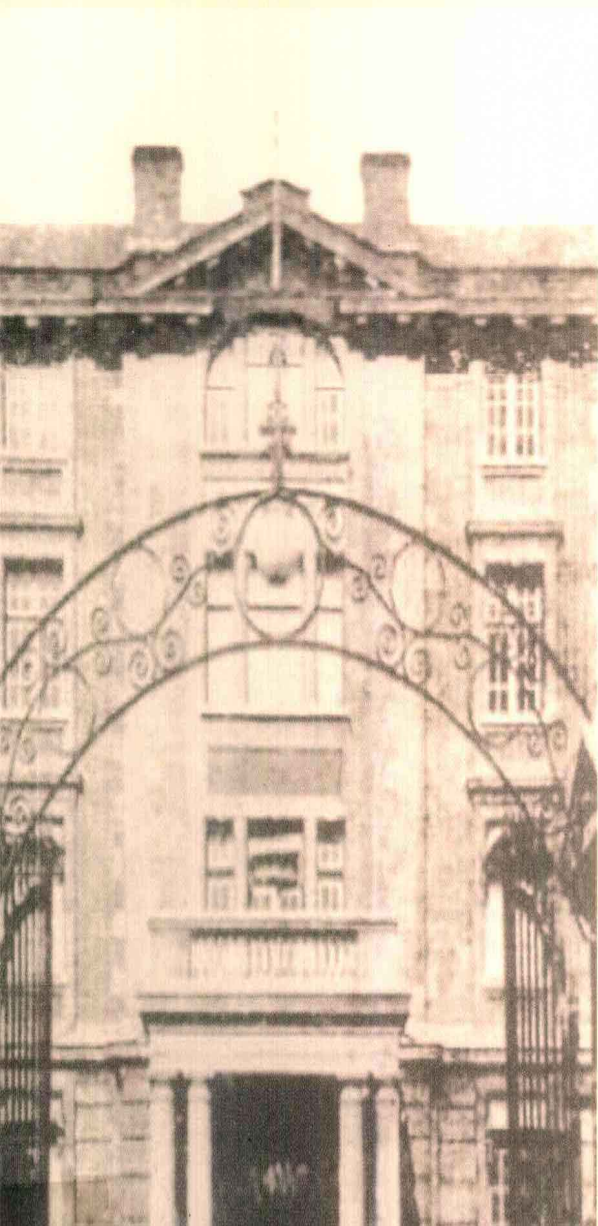


學史與文學

杂谈和回忆

周清澍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學史與文學

杂谈和回忆

周清澍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史与史学:杂谈和回忆/周清澍著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9
ISBN 978-7-5325-5924-4
I. ①学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史学—文集②回忆录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K0-53②I25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92311 号

学史与史学

——杂谈和回忆

周清澍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25 插页 6 字数 336,000

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800

ISBN 978-7-5325-5924-4

K·I390 定价: 68.00 元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

郑天挺先生



郑天挺先生在讲课



1935年邵循正先生在柏林动物园



1979年韩儒林先生（左三）与作者（左一）等在塘沽海港



翁独健先生



张政烺先生



杨人梗先生



向达先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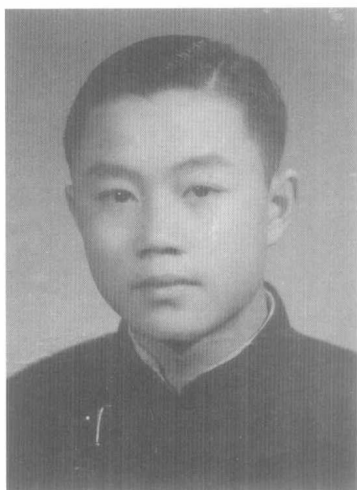
2001年作者与周一良、周良宵先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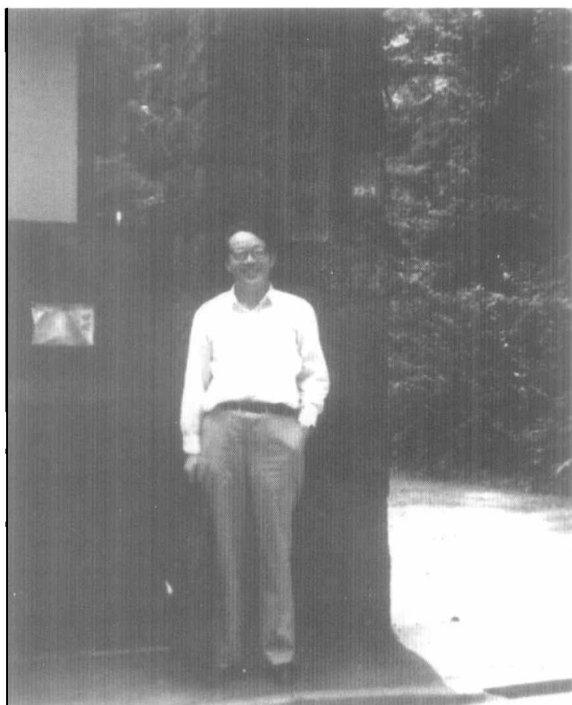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作者与林沉先生在成吉思汗陵



作者与蔡美彪先生



1951年冬作者在沙滩北大
(20周岁留影)



1990年作者于东京静嘉堂

目 录

史 学 家

- 钱大昕 /3
- 张穆、李文田手迹考释 /28
- 洪钧与《元史译文证补》 /40
- 蒙古史学者沈曾植及其手迹 /57
- 怀念郑毅生师 /74
- 缅怀鸿庵师,尊敬的韩副校长 /79
- 纪念独健师百年诞辰 /86
- 追忆邵循正师 /99
- 回忆周一良师 /113
- 回忆向觉明师 /125
- 怀念张政烺师 /135
- 回忆杨人楩师 /146
- 敬贺蔡美彪先生八十大寿感言 /156
- 忆林沉 /161

史 籍 与 文 献

- 元史(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条) /177
- 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 /180
- 点校本《元史》新发现的标点错误和失校 /200
- 元朝名臣事略(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条) /205
- 日本所藏元人诗文别集珍本 /206

元代汉籍在日本的流传和翻刻 /219

元代文献辑佚中的问题

——评《全元文》1—10册 /226

全元文出版的意义及今后的展望 /243

《蒙古源流》初探 /255

藏文古史《红册》 /286

邵循正遗稿刺失德丁集史铁木耳合罕纪(译注)附记 /295

论弢翁藏书

——致周一良先生函 /298

杂 谈 序 跋

边疆史地研究的求实与求效 /307

加强民族研究,发扬中华文明之光 /310

《建国前内蒙古方志考述》序 /312

《蒙古源流研究》序 /338

《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》序 /343

学史片断回忆

回忆叔父和他启发我学历史 /349

沙滩北大二年 /356

历史系筹建的二三事 /389

《元蒙史札》后记 /393

后记 /397

史 学 家

钱 大 昕

清朝乾隆嘉庆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术研究达于鼎盛的时期。在此期间,钱大昕是最杰出的学者之一,是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。

钱大昕字晓征,又字及之,号辛楣,又号竹汀居士,雍正六年(1728)生于江苏嘉定县城西望仙桥镇。祖父名王炯,县学生。父名桂发,县学附生,年四十才入学。大昕家中清贫,祖父以开馆授徒为业,还要靠祖母典当妆奁补助家计。父亲桂发成年后也出外授徒,薪水也不够全家生活,就由母亲从事纺织作为补助。

钱大昕五岁时,开始进私塾上学。十岁以后,先后随祖父和父亲在就聘的私塾学习。十五岁时,进城到塾师曹桂芳的家馆就学,并考取县学生。由于家境贫寒,取得秀才的身份后,他也在十八岁时像祖、父一样,走上了应聘授徒的生涯。他素有神童之称,又刻苦善学,在士子中颇有声名。乾隆十四年(1749),由江苏巡抚指名本县具文送苏州紫阳书院肄业,深得院长王峻赏识,被誉为“天下才”。他结识了苏州宿儒李果、沈彤、惠栋等人,又同后来的大学者王鸣盛、王昶、褚寅亮、曹仁虎等人同学,互相“以古学相策励”。有名师可以问学,有学友可以切磋,这就大大开拓了他的眼界,增长了学识。

两年以后,乾隆皇帝首次南巡,江浙士子皆进赋献诗,大昕进赋一篇,选入一等。奉诏赴江宁行在再试,特赐举人,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。次年,至北京。乾隆十九年,于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,授翰林院庶吉士,以后历任编修、右春坊右赞善、翰林院侍读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、詹事府少詹事。他先后奉旨参加编修《热河志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、《一统志》、《续通志》等书,又累任山东、湖南、浙江、河南主考官。乾隆三十九年,典试河南之后,奉命提督广东学政。次年夏,父桂发去世,他星夜归家,从此不再入京供职。由于他在学术上已名望卓著,所以在退休以后,又先后应两江总督、松太巡道和江苏巡抚的聘请,出任江宁钟山、大仓州娄东和苏州紫阳书院的院长,直至嘉庆九年(1804)七十七岁时卒于紫阳书院。

钱大昕供职翰林院二十余年,归里后主持书院三十年,一直从事修书、主考和书院之类的工作,毕生覃研和倡导经史之学。他从年轻时起就有志于著述,积数十年的功夫,几乎在当时的各个学术领域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

—

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,诚如段玉裁所说:“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,无弗精”,是“自古儒林”中一位很难有的“合众艺而精之”的学者。^{〔1〕}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成就,除了一些专著以外,主要体现在长年积累的笔记、序跋、书信、答问及其它文字中,最后集结为两部综合性的著作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和《潜研堂文集》。“十驾斋”是钱大昕的书斋名,“养新”是他祖父书房上的题匾,寓有温故而知新的意思。为了表示不忘祖训,所以他把平生研习的心得,汇集为《十驾斋养新录》(以下简称《养新录》)一书(二十卷)。他从二十岁开始,读书有得,就写成札记,其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个方面,时间积累达五十年,最后分门别类,编成一书,《养

〔1〕 段玉裁《潜研堂文集序》。

新录》编成后又有所得,再编成《养新余录》三卷。

钱大昕很赞赏笔记体形式的学术著作,曾经说:“自宋沈存中(括,著《梦溪笔谈》)、吴虎臣(曾,著《能改斋漫录》)、洪景卢(迈,著《容斋随笔》)、程泰之(大昌,著《考古篇》、《演繁露》)、孙季昭(奕,著《履斋示儿篇》)、王伯厚(应麟,著《困学纪闻》)诸公穿穴经史,实事求是,虽议论不必尽同,要皆从读书中出,异于游谈无根之士,故能卓然成一家言,而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焉。”^[1]他曾为洪迈和王应麟编撰了年谱,说明他对洪、王二人的著作不仅是赞赏,而且还对他俩的生平和著述曾作过深入的研究。

据钱大昕的曾孙庆曾说:《养新录》是“仿顾氏《日知录》条例”编成的。可见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对他的著述产生过直接的影响。虽然《养新录》概不涉及经世时务,为学术而学术,不无逊色;然而,当时在学术上能全面继承顾炎武,在精深方面甚至可说超过他的,恐怕也只有钱大昕。这两书虽然是读书札记的汇编,但并非信手抄书之作。梁启超说:“钱大昕发明古无轻唇音,试读《十驾斋养新录》本条,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。故顾氏(炎武)谓一年仅能得十余条,非虚言也。……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,固当于此求之。”^[2]后代学者常将《日知录》和《养新录》并提,实际上是承认这两书为最杰出的综合性学术著作。学者钱仪吉也盛赞钱大昕是“继亭林后此一人”。^[3]

钱大昕的另一部综合性学术著作是《潜研堂文集》(以下简称《文集》)。他在乾隆三十二年告假回家时,买到了嘉定城内孩儿桥弄的住宅,名其堂为“潜研”,所以他的诗、文集都冠以“潜研堂”三字。文集一般多是古人的应酬文字,其中杰出的可以看成是散文佳作,因此常将文集纳入文学的范围。钱大昕却认为:“夫道之显者谓之文,六经子史皆至文也。后世传文苑,徒取工于词翰者列之。”失去了文以传道的作用。^[4]在

[1] 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五《严久能娱亲雅言序》。

[2] 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第45页。

[3] 《竹汀钱先生象赞》,《衍石斋纪事稿》卷九。

[4] 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六《味经窝类稿序》。

他五十卷的文集中,除个别应酬文字外,其余论、说、答问、辨、考、杂著、记、序、记事、题跋、书信、传、碑、墓志铭等,无不贯穿经史,避免空泛浮词,力求字字有据,将文集也变成纯学术性的论著,“中有所见,随意抒写,而皆经史之精液”。〔1〕

以《文集》中答问十二卷、书信四卷为例,对象具名的多是当时知名学者,所提的问题方面很广,要一一作出答复,必须有高出一筹的学识。在答疑的论述中,他都能精确地援引资料,进行透彻的分析,作出精辟的结论。

《养新录》和《文集》的具体内容很难一一列举,只能在下文涉及各个学科时分别举例评述。

二

经学方面。乾隆初期,惠栋、沈彤等人在苏州倡导经术,钱大昕肄业于紫阳书院时,也接受了惠栋等人的影响。后来入京,供职翰林,见识更宽,学问大进,在前人的基础上,将经学研究又推进了一步,成为乾嘉经学大师之一。由于他把精力分散到史学及其它各个学术领域,因此,他生前没有出过一部专攻经书的著作。他的《唐石经考异》(十三卷)和《经典文字考异》(三卷,钱侗增订)两书,主要是经文的校订。有关经学的精辟论述,散见于《养新录》和《文集》之中。江藩的《汉学师承记》具体地列举了他对诸经的突出见解,范围非常广泛,称他“不专治一经,而无经不通”。王昶也认为这些见解“皆说经家所未尝发者”。〔2〕

钱大昕推崇顾炎武、阎若璩、惠士奇等人“研覃经训,由文字、声音、训诂得义理之真”;认为“诂训必依汉儒,以其去古未远”。〔3〕这种观点在清代已形成一代学风,被称为“汉学”,而与专重义理的“宋学”相对立,

〔1〕 段玉裁《潜研堂文集序》。

〔2〕 王昶《春融堂集》卷五五《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》。

〔3〕 《文集》卷二四《臧玉林经义杂识序》。